

## 来到农村的文工队

德永直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曾经在长野县上伊那郡F村的一户农家度过三个夜晚。七月中旬我就离开东京，先在该县諏访郡川岸村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川岸工厂女工宿舍住过五宿，后来又在工厂周围的农家度过十夜，才来到这里。在F村，我的任务是：出席当地青年会主办的文艺讲演会；同去其他村进行巡回演出的川岸工会文工队在这里会合，协助他们演出。

在他们当中坂井梅最活跃。她是自二月以来组织罢工的川岸工会厂外斗争部的成员，是我现在寄宿的那家农户的姑娘。当我轮流住在川岸村的几户农家的时候，是她来同我联系，帮我提皮包，把我接到F村来的。到村的那一天，天气热得受不了，我呆在家里没敢出门。可是直到我要睡了，她还没有回来。她既要联系在F村组成自救组<sup>①</sup>的七名川

<sup>①</sup> 自救组是罢工的工人为了长期坚持罢工，按居住地区组成小组，自谋生活的一种组织形式，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岸工厂的工人，又要联系主办川岸文工队木偶戏的F村共产党支部，还要同主办我的文艺讲演会的村青年会联系，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她是共产党员，今年二十六岁，白净脸儿，个儿不高。这个姑娘从片仓缫丝厂时期就在川岸工厂，已有十二年工龄；她很快就迷上了自己的工作。她有一种毛病：走起路来左右摆动着肩膀，步子迈得飞快，样子挺可笑。

拿我来讲，头一回听说工会里有“厂外斗争部”这种罢工斗争组织。据罢工团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人民斗争部”。现在我在F村所协助作的，就是“人民斗争部”在文化方面的部分工作。我的任务是：鼓励罢工工人组成自救组，自谋生计；向罢工工人的家属和当地群众宣讲罢工的目地，并要求他们支持罢工。仅就这一点来说，过去也是这样做的，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然而随着罢工性质的变化，宣讲的内容则有很大区别。而且应该让参加自救组的七名罢工工人，直接在反动气焰嚣张的村庄牢固地建立立脚点；象川岸工厂那样，已经罢工半年多，这一点就显得愈加重要；尤其是在当前，它成了同跟公司方面紧密勾结的民同派<sup>①</sup>之间的一场争夺战。

翌晨天没亮，坂井梅就出门去同已经来到邻村的文工队商量演出的事，过了晌午才回来。我们急忙给文工队赶

---

<sup>①</sup> 民同派是民主化同盟派的简称，是从日本产业工会总联合会分裂出来的右翼工会组织。

画宣传画。这些画必须在天黑以前贴遍全村。我们把旧报纸一裁四开，上面写着：《非常有趣的木偶戏》、《钝太木桶店》、《画家普吉》、《大箱子》和幻灯电影（现代化幻灯片）《白袜子一家打砸抢记》等文艺节目，此外还写上会场地址和票价五圆。因为是旧报纸，如果墨太浅，人家就会看不清楚。坂井梅这时显得挺固执，她定要在“非常有趣”下面加上“笑得肚子疼”这样的字眼儿。也许因为这个词儿是她想出来的，所以尽管我说写上“非常有趣”也就够了，但她还是坚持非要写上去。她把一个“笑”字的“竹”字头，撇点之间的距离拉得太大，歪七扭八，伸胳膊蹶腿的，几个字就占满了纸面。

“你说的那个美祢姐，是大岛美祢子吗？”当坂井梅数起明天要来的文工队员的名字的时候，我插嘴问道。

“是的，就是那个大岛美祢姐，另外还有松井先生、芳姐、渡边先生、柏原先生，七个人，对吧？”

她特别细心，换一只手拿笔，扳起手指头数给我看。天气这么热，她却仍然穿着白色上衣和裙子，鼻子上渗出颗颗汗珠。见到“从东京来的人”显得有些羞怯，即便在我这样的老头子面前，也决不肯脱得光剩衬裙。

“她会操演木偶戏吗？”

“是呀，她会不会操演木偶戏呢？”她又把脸伏在宣传画上，操着带地方口音的标准话说，“可是，美祢姐是在合唱团里呆过的呀。”

我对大岛美祢子有点印象。我是在今年四月，天还冷

的时候，住在川岸工厂女工宿舍时同她相识的。当时我在一篇报告文学《寄自川岸工厂》里，这样描写过她：

……到了晚上，我到第二宿舍尽头上去看“工会文库”。这是一间约有十来平米的、象是仓库似的地板间，里面放着一个带玻璃门的书柜，书少得可怜，就摆着那么二百来本。——当我关上书柜门刚要走出房间的时候，发现一个女孩子从方才就蜷曲着坐在窗户边，在昏暗的灯光下，全神贯注地在写什么。我记得她扎着两条小辫儿，从侧面看去，鼻子就象是在鼓鼓的脸蛋之间塌陷下去似的。

“在写什么呢？”

穿着红色混纺毛衣的姑娘，吃惊似地抬起头来，但并没有用手去捂起放在桌上的没有写完的稿子。

“是给我的朋友的。”

“嗯！”

“是在松本市日本涡轮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我要教给他。”

她头发有些发红，用铅笔搔了搔辫根下的头皮，身体靠着桌子，朝我笑着说：“认谱，可真是太难了呀！”

桌上放着《贝加尔湖之歌》的歌谱，她正在把它用铅笔抄在纸上，象一排排的蝌蚪趴在上面。她坐在窗下，风从破碎的玻璃缝中刮了进来。不知道她已经抄了几个小时呢。

根据我制作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来看，这个姑娘叫大岛美祿子，十九岁，小学六年级毕业，长野县諏访市人，一家八口，除父母外，还有十七岁和十五岁的两个弟弟，十岁、七岁和三岁的三个妹妹。她曾经在片仓缫丝厂做工一年半，在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做工四年。母亲从去年五月生病，卧床不起。父亲是席匠，

因为近来没活儿，所以在家做饭、买个东西什么的。她每月收入两千三百圆，其中一千圆寄给父亲。母亲对她说，罢什么工呀，不如早一点去缫丝厂干活去得啦！父亲同情她，对她说，还是跟大伙儿一道干吧……

“听我说，先生——”她用铅笔敲着那首没有抄完的歌谱，用鼻音哼哼着曲调，突然仰起脸来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想给《我们的伙伴》投稿，您能给我看一看吗？”

我点点头。她把两只手举到胸前，象是说“这回可好了”似地微微一笑，猛然向我鞠了一躬，说了一声：“谢谢！”

这次住在女工宿舍，我没有见到她，也一直没有发觉她参加了文工队。

“先生，请喝茶！”

当我画完四五十张宣传画的时候，在旁边炉沿儿上沏好茶の坂井梅的母亲将一杯茶放在我的膝前说。她头上系着一条布巾，微露头发，硬把已经三岁的、挺大的一个男孩子捆在背上，说：“这孩子太淘气！”她也在女儿跟前放了一杯。

“我不渴，方才喝了好多水。”坂井梅毫不客气地说。

她把已经干了的宣传画摞起来，准备马上就去贴。

“林田茂她们不来帮忙吗？”我问起昨晚露过一面的村自救组负责人。

“是说好要来的，可是茂姐家里第三茬草还没有割，今年他们家养了不少夏蚕呢。”

这个自救组清一色都是姑娘；七个人当中有六个帮助

搞农业。

“那末，先生也请作好准备吧。”

“好的，好的。”

“路有点远，行吗？”

坂井梅抱着一大卷画在旧报纸上的宣传画，下到土间，戴上草帽，回头冲我笑了笑就走了。今晚的文艺讲演会的会场是在一个山谷的对过，她还有领我到那里去的任务。

“太辛苦啦！瞧，你们多忙呀！”

梅的母亲站在炉子对面的地板间里，从蚕台把蚕箠一个一个地搬出来，撒上桑叶。她蹲下来的时候，睡在背上的孙子的脚套拉到地上。

“已经四眠了吧。”

“喂。”

“慢慢该忙起来啦！”

“哪里，就这么一点点，不算啥。”

我在炉边俯卧下来。外面的阳光依然很毒，我抬起眼睛看到后门口种的南瓜，被晒得无精打采，白白的叶背儿反射过来的阳光令人刺目。南瓜架下拴着一头山羊，热得难受，一直咩咩乱叫。我很想睡一觉。在农村，不论在哪里开会，都要开到很晚，而且不论在哪里都要受到跳蚤和蚊子的侵扰，一直睡眠不足。

眼睛望着昏暗的、没有天花板的顶棚，我在这里也感觉到了不论在哪里都感觉到的我的处境之微妙。参加罢工的职工的家属，尤其是农民家属，即使他们的子女是共产党

员，大多数也不赞成子女参加罢工斗争。这家的人们现在都出门了，屋里显得挺安静，却给我一种不能随意舒展手脚的感觉。在土间顶上打起竹架，上面挂着蓑衣、铁锹，放着空草袋和种子袋等等。我还没有完全记住这家全部成员的模样。但根据《家庭情况调查表》来看，坂井家有耕地三反七亩<sup>①</sup>，父亲和嫂子务农，大女儿已出嫁，大儿子只能在夏季去下伊那蚕种厂打短工，坂井梅是二女儿，二儿子是村邮局的邮递员，三女儿在上伊那缫丝厂做工，三儿子是泥瓦匠学徒工，四儿子上小学，还有一个孙子。

“罢工……会怎么样呢？”

约莫睡了一些时候，忽然我头上响起了话语。那是母亲，象所有的老太婆一样，声音发颤。回来歇晌的父亲穿着草鞋就把脚踏在炉沿上，叼着烟袋，向我这边瞅着。母亲把一杯茶放在我跟前。嫂嫂背着个大背篓，可能是利用歇晌这点空隙采桑叶去。现在她正从低矮的稻草屋的屋檐下走向太阳地，白色的蓑笠反射出耀眼的强光，直刺着我蒙眬初醒的睡眼。

“是的，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斗争啊！”我一面点烟一面说。

不论在什么地方，我同罢工工人的家属谈话时一开头总是这句话，在这里也不例外。家属对罢工也是提心吊胆的。根据《家庭情况调查表》来看，坂井梅每月收入三千五

---

<sup>①</sup> 反是日本的面积单位，每反等于十日亩，十日亩约合—·四九市亩。

百圓(包括长子在内,她是全家收入最多的),住在女工宿舍里,每月给家里汇一千圓。现在不仅半年多没发工资,而且正如东京的报纸上所登的,今年三月的一个下雪天,资方为了对付五百多名职工,动员了一千多名武装警察去封闭工厂。这时工人们挥动红旗,高唱革命歌曲。因此“不能娶川岸工厂的女工作媳妇”这种流言蜚语,在这个村子里也传播得很广。

“希望家属方面对罢工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工会方面也不是因为凭喜好,才搞罢工的。”

我说完开场白之后,便向他们谈起川岸工厂罢工,进而谈到东京芝浦电气公司全国四十多个工厂的复杂而且规模巨大的斗争。但实际上要说明白是很困难的。我曾走访过几家参加罢工的家庭,发现不论哪家对罢工都不理解。首先许多参加罢工的人自己就没有充分理解。所以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这件事领会起来困难,不是因为说明困难,而是要说明的事情本身就难以领会。

比方说,这次东芝工人的罢工斗争,是因为资方在借助金融资本势力组织起来的新的金融机构的压力下,整顿企业、裁减工人而引起的。正如东京各报也大肆宣扬的那样,这是对私人企业的第一次考验,关系到战后能不能重建日本资本主义;这次裁员竟连吉田内阁都带头支持,是具有政治性的。的确,光我周遭所看到的东芝系统在神奈川和静冈的四五个工厂,库存的积压产品多极了。有电话机、打字



机、诱蛾灯、灯泡、真空管和水表等等。六月，在旁听东芝工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时候，我听说整个东芝五月份生产总额为五亿几千万圆，销售以后仅仅收回现款一亿几千万圆。因为生产了成品也卖不出去，所以资本家就想裁减工人，缩减生产，好作到够本。作为资本家来说，这么想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商品卖不出去并不是由于生产过剩，而是因为失业的人太多，人民的购买力下降了。虽然大家缺少电话、打字机和收音机，可是没有钱买。由于缺少诱蛾灯和电灯泡，甚至妨碍了农业的发展。如果出现更大规模的失业者，那就不只是资本家的腰包如何的问题，整个日本都要完蛋。——话说到这里，不管哪个家庭都能听明白。拿中等以下的农户来说吧，有收音机的是少数，坂井梅家也是这样，岂止没有收音机，连报纸都没订。可是再往下说，就不那么容易懂了。——因此吉田内阁所说的“只要国民含辛茹苦，总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之类的话，纯粹是扯淡。失业工人比比皆是，工农业衰微凋敝，日子又怎能好得起来呢！吉田对日本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的中国，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没有好感。对其他南洋地区和菲律宾的出口，又受到外国商品的排挤。因此尽管日本的大资本家的腰包又鼓起来了，然而国民没有实力，最后只能沦为外国的附庸资本——买办资本家。在沦为殖民地的国家里，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本来日本资本家在他们自己发动的这次战争中就已经砸了锅。因此必须尽量缩小资本家的私利中心主义。产品滞销，这不是东芝一家，象日产汽车公司就

有数千辆汽车堆在仓库里生锈。现在应该把这些库存产品，敞开借给缺乏这些东西的农村、工厂和家庭，让他们迅速把生产搞上去。这样一来，就没有失业的人了，工农业就会逐渐恢复，人民的生活也会得到改善。于是他们就能够向原来的工厂还债。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是以资本家个人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法——日本就要毁灭。因此参加罢工的人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不这样进行斗争，罢工是不能获胜的……

我大致上是这样说的。就我的能力来说，我不能讲得更通俗了；同时即使要讲得更通俗一些，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也很难再通俗了。也就是说，听的人也有一个必须相应地提高水平的问题。

“嘿嘿，这么深奥的事，我们可听不明白啊！”又瘦又矮的母亲，她那没有什么奢望的、因没了牙而瘪进去的嘴角上满是皱纹，包头的布巾下露出几缕白发，她歪着脑袋说，“……喏，不行就不行，早点了结算了，嗯？”

父亲沉默不语。他不时地从嘴上拿开烟袋，歪着头象是想要说什么。可一会儿又把烟袋叼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顶棚上被烟熏黑了的房梁。在蓬乱的、白棕斑驳的头发上总是系着一条布巾，象一般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咳嗽着。

昨晚我也跟这位老人唠过嗑，听他说F村的小学 and 邮局都要裁人，更奇怪的是在F村流传着什么“要是裁掉教员和邮差就可以少缴税”的谣言。他还说，尽管局长还没有公布，但邮局十二人当中要裁减三人，他那当邮递员的二儿

子，是战争结束复员后才进邮局的，因此感到担心。尽管这家被定为所谓的“破落农户”，但在收割前仍摊派了四袋<sup>①</sup>三斗麦子，去年他们交了五千圆税钱。老人从嘴上拿开烟袋，时左时右地歪着脑袋思索着。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了一句：“政府也是，唉！裁这么多人，到底是要干啥呀？”

## 二

我是东芝工会联合会总部的文化顾问，我的任务是协助属于工会的文工队和文化小组的工作，帮助出主意。因此我虽然不了解劳资纠纷的焦点所在，却知道川岸工会执行委员会似乎在千方百计地寻求解决办法。工会联合会也晓得川岸等厂是最早开始罢工斗争的。因此他们竭力设法早日结束这次罢工，哪怕是单独解决也好。无奈资方就是“不想生产”了。对人民来说，不管这种东西多么缺乏，只要“卖不出去”，资本家就说是“生产过剩”。因此就是你罢上三个月乃至半载，他根本不在乎。

罢工拖得越长，文工队的任务显得越重要。这里的文工队员，如果全部编进来，可以分成两个队。现在只编一个队则是为了使队员们轮换着，不间断地进行活动。他们以村或者镇的自救组为基地，有时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有时得到

---

<sup>①</sup> 原文作袋，系装粮食、木炭等用的稻草袋，一袋可以装四日斗麦子，每日斗等于一·八四市斗。

社会党或文化团体的支援，到各村去巡回演出。要是到了这类势力薄弱的村庄，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只能在农户的屋檐下过夜，第二天精疲力尽地走回家。

罢工工人的自救组增加了。春天我来的时候，在工厂的广场上，到处可以看到罢工的工人在作早操。可是这次我来这里住了五天，只看见两天有早操；而且分散在女工宿舍空屋子里的罢工组织的各机构中进行活动的，也只有五六十人。

随着自救组的增加，民同派的势力也强大起来了。罢工团的经济拮据情况和执行委员会的新方针，用不了二十四小时，就从长野一下子传到东京总公司董事们的耳朵里，在村镇上对罢工团散布了许多谣言。文工队去了以后巩固起来的村自救组，刚过半个月，则由于民同派的破坏又开始动摇起来。……

一天下午，我在书记局办公室睡午觉，为了躲闭西晒的阳光，把身子快要贴到墙壁了，突然被隔壁嘈杂的人声吵醒。在我醒来的刹那间，心里想：哎呀，大概是吧？就马上起来了。

说真的，我离开东京以后，净睡午觉了。这间屋子的主人书记长H君没有蚊帐。H君也许因为个子矮，被子总是盖得挺严实。只要他睡着，不管蚊子还是跳蚤，他都不在乎。我和他一样，可就是被子盖不好，用报纸蒙上脸又觉得憋得慌。最后就拿着被子和报纸在屋里到处转移。不知不觉间，没有防雨板的玻璃窗就发白了。

我走到檐廊一看，隔壁的执行委员会办公室，连门口外面都挤满了人。正搂着坂井梅的肩膀往里看的伊那出身的女书记I君，红胖的脸蛋气得鼓鼓的，回过头来气愤地对我说：“哎呀，那种不要脸的事，亏他们说得出口！”

果然是这样。尽管挤满了人，还是可以看到在一张粗糙的大木桌边坐着委员长A君和副委员长I君等人，与他们对峙而坐的是对方的中心人物民同派的头头S君和T君两人。这间屋子原来也是缫丝厂划一的女工宿舍，只有用十五领没包边的席铺成的一块正方的地方，没有任何摆设。在三十多人当中，有五六个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其余是S派和自救组的人，他们多数都有家属。现在民同派已站出来从正面攻击执行委员会。在这里，西晒的阳光也一直照射到屋角；全屋的人，额上都渗出了汗珠。由于紧张的缘故，除了T君格外高亢的话声外，一切都很寂静。这位T君是个下级办事员，所谓的雄辩家；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三十五六岁，前额突出得出奇，鼻子又红又大。一对深陷的眼睛经常挂着血丝，好象什么东西都只看了半截儿，就又去看别的似的。

“你们瞧，嗯，我们这份儿可怜相！——从二月以来，已经过半年啦。我们不知道执行委员会怎么样，反正我们连可以拿出去当的东西也没有了……”

他充血的眼睛，从低着头的A君的额上移到站在后边墙根的我的身上，又从我身上移向廊子上的人们，挨个儿地扫视了一圈。S君坐在A委员长对面，倚着桌子，胳膊肘支

在桌上托着下巴，他让T君一个人说，自己象是专等关键的时刻才说话似的。就方才我所听到的，可以看出他们是要执行委员会辞职。他们的意思好象是说：因为公司已经表明只要执行委员会不是“红色的”，就同意进行谈判，所以要执行委员会让位。我不知道S君是哪个车间的，他不时地用眼角儿瞟着我。我曾在《寄自川岸工厂》一文中，把S君描写成一个“气质摸不透的”、“秃了额顶的五十岁的男子”，可是现在他的气质我已经完全“摸透”了。他那秃额上暴出的粗粗青筋，他那眼角上吊的烁烁贼眼，他那尖尖的鹰钩鼻子，这是一副一望就难以忘记的奸相。

“据说共产党在九月革命<sup>①</sup>成功以前，是不准备停止罢工的。可是嘛，我们给共产党作垫脚石可受不了……”

T君再次大声一嚷，在S君后面响起了“说得对！”的喊声。这位穿着军服的F君有四十来岁，他象呕气似地把后脑勺靠在墙上，仰着脸，伸着两腿。他是个自夸技术高明的钳工，人所共知的民同派；我知道罢工一开始，他就钻到别的工厂去干活，找窍门赚钱。有的老工人盘腿坐着，把脸伏在膝上，象是说：“打退堂鼓吧，对不起伙伴，可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呀！”他们态度不一，在大约二十来个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自救组的成员，并不是什么民同派，这反映出罢工工人的生活有多么艰苦。

---

① 一九四九年日本政府当局为了镇压工人运动，曾造谣说日本共产党在这年九月要发动武装革命。

委员长A君穿着被汗水浸黑了的敞领衬衫，背对着大家，用低沉的声音一一回答着问题。他有三十四五岁，也许是个子高大的缘故，显得特别稳重。他谈到：为了尽早结束罢工斗争已经想到的各种办法；为了解决因斗争延长而给大家造成的生活困难所采取的对策；A君自己不用说东西都当光了，老婆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到冈谷市职业辅导所去干活儿，可是每天只能挣二十圆；不知道共产党是否说过那样的话，但我们丝毫没有那种想法，不应把川岸工会执行委员会同共产党混同起来。现任执行委员会是每年经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不在这里表明去留，等等。最后A君突然仰起脸来说：“总而言之，我们的斗争策略是会很快传到公司方面去的！”

说着，他看见那个长着鹰钩鼻子的S君不高兴地把脸扭到一边去了。——公司打算用“回家休息”、“调换工作”以及其他名义，裁减近一半的职工，我看在这里面，S派和公司方面象是有什么默契。

民同派的攻势是不折不扣的公司方面的攻势。民同派同现执行委员会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以前就有一个民同派的大头子K君，是高级职员，他在最危急的时刻，阴谋被戳穿，给工会开除了；尽管工会把他开除，公司却爱不忍释，因此K君仍住在工厂附近的公司宿舍里，成了民同派的幕后人物，同村议会和镇上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了。从他们正面站出来攻击工会的情况来看，他们背地里究竟争取到多少自救组呢？详情我虽然不晓得，可是那天的舌战，到后来

形成来囤窝圈子的局面，再没有发生新的事态。在第二天召开的每月定期大会上，他们又发动了同样的攻击。

最近，一直是晴空万里，炎日绵绵。大会九点开始，首先是工会联合会代表、执行委员和全国委员作报告，另外还让我讲了话，到了讨论议题的时候，又是西晒够劲儿的时刻。自救组的人也都纷纷远道赶来出席在工厂食堂召开的每月定期大会。与春天相比，人数少了一半，但还有二百四五十人。讲台的左手是妇女席，在正中央的后边，是民同派的三四十人，昨天见过面的以T君为首的几个人也夹杂在当中，那里正在酿成一种不寻常的空气。参加大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张编有号码的红色的决议票。在西晒的地方，有的在帽子上搭了一条手巾，有的挪动椅子躲开阳光，所以那里空出一大块地方。S君来得很晚，慌慌张张地进入会场，走到后边正中那帮人那里，弯着腰到处跟人低声耳语。这种作法非常露骨，是挑战性的。一会儿，他又抓起木屐，到走廊去了；一会儿，又折回来，窃窃私语。——有两个穿着警卫服的大汉在走廊上踱来踱去，监视着会场。总之他们的名义是警戒今年三月发生劳资冲突事件以来资方在食堂走廊正中拉上绳子划为“不准入内”的那块禁区的。

“我首先从结论谈起。也就是说，我要追究这届执行委员会的责任。既然执行委员会没有能力解决……”

T君从他们那伙人当中站起来，身体左晃右摆地大喊大叫。刹那间整个会场都紧张起来，搦动扇子和帽子的手都停住了。T君不安地转动着他那充血的眼珠，提高嗓门叫嚷



着。尽管他说得振振有词，但内容和昨天讲的一样，并没有什么惊人的东西。可是在他的周围，象刮风一般，不时地响起了掌声和“说得对！”的叫喊声。尽管有人从台下的执行委员会席上起来一一答辩，然而他却仍旧站着，重复讲他那老一套。有人举手提出：“对讨论的问题有意见。”他却怒气冲冲地说：“我正在发言！”据我观察，他是要引导到能够控制会议气氛的时候，一举提出改选执行委员会的动议。T君的攻击始终抓住“赤色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党九月革命”不放。这个厂的特点是，占职工半数的妇女部的力量最强。可是连参加会议的妇女席上的一部分人——象是在自救组干庄稼活儿，皮肤晒黑了的姑娘们——也都流露出一种无所适从、犹豫不定的神色。要说是危机，这一瞬间恐怕是最大的危机了。这时，执行委员会席上的人都一齐站了起来。

“同大家商量商量，方才收到紧急情报，执行委员会打算用十来分钟的时间讨论一下，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吗？”

听主席这么一讲，后边当中那伙人里面有几个人，踮起脚尖来。在一种不安的空气中，“没有意见”的声音占多数。只有T君一个人还在那里蹲蹲站站地嚷着“反对！”刚过五分钟，他们又回到执行委员席。副委员长I君在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矮个子、搞技术出身的I君，是个不擅长所谓讲演的人。他腼腆地笑着，小声讲了起来。他讲话的内容吸引了大家，会场变得一片寂静。根据情报，T君在某月某日和某人，在东京会见了公司的某某董事；又在某月某日，单

独一个人拜访了公司的负责人；还在某月某日去静冈，会见了一个脱离了工会联合会的民同派F工厂工会领导人，并进行了协商。——正好T君站在那里，左右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弄得他不敢蹲下去，一个劲儿地在那里欠身站着，骨碌碌地转动着深陷的眼珠。

“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是否公布这个情报，最后决定公布。方才T君对执行委员会的攻击，象最近的报纸一样是充满恶意的。这一点我想凡是认真进行斗争的工会会员都已经注意到了。当然执行委员会是要经常接受大家的批评的，然而这与T君的恶意攻击毫无共同之处。”

I君用和蔼的口气讲了这番意思，象是自己也在考虑什么似的，把头一歪，然后又仰起脸来，说：“执行委员会让大家自己分析判断。对这个问题，如果T君有要求，我们准备提供更详细的情报，还可让提供情报的人出场作证。”

要求发言的声音一涌而出。我望着S君。他那暴出青筋的秃额头，一会儿伸出来，一会儿又赶忙缩回去，跟旁边的人窃窃私语什么。接着又把脸向上一仰，左右抽动着尖尖的鼻子。没等发言人把话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愤怒的嚷声：“主席！”“主席！”这时T君已经改变了策略。他仍旧站着，无视主席，直接跟提出质问的人争辩起来。他说：“是的，我承认。不过，这又算什么呢？我们不能光顾斗争，难道生活就不重要吗？我也是为了这一点，才……”

在一片愤怒的叫骂声中，形势明显对他不利，弄不好还可能把他从工会开除。T君摆出一副临死还要咬你一口的

架势。我认为所谓情报就不会只是事情新，在工会联合会这样一个大组织里，象这样的情报恐怕早就掌握了，现在不过是为了扑灭飞来的火星才把它抛出来罢了。这时我看见委员长 A 君在执行委员席上，抬起眼睛注视着会场，跟邻座的 H 君小声说些什么。我向那边一看，果然 S 君不见了。F 君等两、三个人站了起来象是准备退场。书记长 H 君抓起木屐，从我跟前挤过去，从窗口跳下去了。我也跟在 H 君之后跳了下去。本来象我这么大的岁数，还是不跳的好。因为食堂的窗户很高，我的屁股给狠狠地墩了一下。

“快，快！老 K 这家伙刚才骑自行车跑了！”

我一瘸一拐地走回书记局办公室，看到坂井梅同厂外斗争部的 A 姑娘并肩站在冲广场的一个窗口前，探着头，晃着身子叫喊着。

“好！我骑自行车追他去！”

H 君一面披军服上衣，一面从走廊往自行车存车处跑去。女书记 I 君把脚踏在窗户上系鞋带，这时一个叫 Y 的青年，从走廊那边进来。

“我该到哪儿去呢？”

黑脸盘儿，细高个儿，二十二三岁的 Y，是木曾谷人。因为他是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所以我认识他。他干什么事总是慢吞吞的，不着急。

“怎么搞的，还怔着呀！”

穿好帆布鞋的 I 姑娘，从窗台上跳下来，隔着窗户生气

地嚷道：“你快到上諏访车站去吧！”

“去上諏访车站？多远啊！”

三个姑娘并肩穿过广场，向便门跑去。另一个年轻人从走廊跳进来，象要把 Y 君抢走一样，连拽带推地催他快走，他们也跳窗跑了。

夕阳西下，广场上出现一片阴影。我来到广场的一角的白杨树下，从这里可以看见厂后横跨天龙河的大桥。一层层的梯田从桥旁伸延开来；一栋栋的村舍掩没在杂木林中。正在看着的当儿，工人纠察队的姑娘们象跑似地渡过桥去，她们的背影映入我的眼帘。大工贼“老 K 骑自行车跑了”，这意味着退了场的 S 君等人要采取第二步的行动，纠察队可能是在追赶他们。回头一看，食堂里大会仍然在进行，但是舞台已经转到工厂的四周去了。

### 三

F 村青年会主办的文艺讲演会开过后的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蚊香烧尽，香灰原形不变地从灰碟上落到代替草席的纸席上。这户农民家里也没有蚊帐。拉上多孔的防雨板，闷热得透不过气来。仰望顶棚，眼前浮现出昨天晚上那个穿浅色衬衣，系红色领带，嘴角烂得白糊糊的青年的那副令人不愉快的脸来。……

讲演会晚上十点开始，半夜两点才散会，我和坂井梅到家以后都三点多了。我讲的是文艺，也偶尔谈了谈下山事

件和三鹰事件<sup>①</sup>，听众里面许多人都探着身子听得出神，我就多讲了一些。三鹰事件是我住在川岸村农民家里的时候，从号外上看到的那么一点，了解不多，因此只谈了谈自己的感想。可是这样一来，听众明显地分成两派。在青年集会所这个会场里，草席上摆着长桌，听会的一半是青年妇女，一半是年轻小伙子，后边是老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分裂的空气逐渐明显起来，据说是会长的那个穿白夏布单衣的青年，就同那个穿着敞领衬衫的文化部长离开了座位，到一个角落里商量去了。方才在我右边规规矩矩地坐着的妇女也老往那边看。我听到左边的男青年和后边的老人说：“先生，换个地方再给我们讲一次吧！”我听说这里的文化部比较进步，反对村议会给青年会规定的“一律不许过问政治”的制度。不一会儿，那个三十来岁、穿着白夏布单衣的瘦长脸、仪表不凡的青年会会长突然走到我的面前。他一转身，屁股就冲着我坐下，跟妇女们聊开了。那个穿敞领衬衫、剃着光头、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文化部长，在左边的角落里被两三个象是干事的青年包围了，在竭力争辩什么。说是要换会场，当我从他的背后走过的时候，一个系着外国样式的红色领带、穿着浅色衬衣、细高个儿、鼓颧骨、黑脸盘儿的青年，

<sup>①</sup> 下山事件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五日，日本国营铁道总裁下山被人谋害后丢在铁轨上，叫火车压碎。三鹰事件是同月十七日晚在三鹰车站一辆无人驾驶的电车突然从车站冲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十三人负伤。日本反动派制造了这些事件，嫁祸于当时的共产党和工会，逮捕了共产党员和左翼工会的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的战士们和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揭穿了敌人的阴谋。

冲着文化部长，仰着油亮的脑袋，用扇子敲着手掌说：“什么，哼！那还不是个赤色分子吗？”

我的演讲可能太蹩脚。可是我没有想到竟有人如此武断，无情地用泥足来践踏我……

当我走到炉边的时候，从地里归来的坂井梅的父亲和嫂嫂正在吃午饭。我问起坂井梅时，她母亲一面让我吃饭一面回答道：“她一清早就到公共汽车终点站接文工队去了。”尽管说是邻村，如果不爬山，就得绕远。从伊那电力铁道的 I 站乘公共汽车需三四十分钟，从这里到终点站约一里地。

“特地来一趟，可别下雨呀！”父亲一面用饭碗喝着白开水，一面自言自语地说。

在一张陈旧的箱式小案<sup>①</sup>上放着一大碗酱拌橘皮丝和辣子丝，父亲用筷子夹上一口菜，闭上少齿的嘴嚼着，用白开水送下去。赞不赞成女儿他们干的事情另当别论，反正老人是很喜欢看木偶戏的。

“早晨，西驹山上有云彩来着。”

这一带的人叫作“西驹”的这个山，比别的山格外高，茅屋的屋檐遮住视线，望不见山顶。

我想这么好的天，怎么会下雨呢？向屋檐外一看，突然发现黑影，三个陌生人走进堂屋门口。

“我们是××机务段的工人，是这次被裁下来的。……”

---

① 原文作箱膳，里面放食器，吃饭时把箱盖当盘子使用。

他们每人背着个空油桶，走进堂屋来的那个人，摘下白色登山帽说道。这人三十上下，穿着一件被汗水渍黄了的绉纱衬衣，一条国营铁道的劳动裤，象用尘土染过似的，变成了白色。

“十块钱、五块钱都可以，买点糖块好吗？比市价还要便宜三成呢。”

那人直挺挺地站在堂屋里。在黑瘦的脸上，眼镜闪着光。他说话太生硬，显得有些腼腆、不习惯于这类事。

“怎么样？买五块钱的也行。”

老人看样子连花十圆都不好随便决定，就把视线落在炉子上；母亲呢，嘴边浮笑，不吱声。因此那个穿绉纱衫的又说了一遍。他把背上的油桶往上背了背，挠了挠头，眼往下瞅着。于是另外一个又进来了，这人二十二三岁，穿着国营铁道的工作服上衣，敞着怀。他也摘了帽子。

“那末，糖块，不买就算啦……”他笔直地仰起脸来，从和尚头的前额淌着汗水，突然提高嗓门说：“……我们是被吉田内阁裁掉的。被裁的伙伴，全国有几万人哩……”

说话的人两颊胖胖的，显得挺精神，他把铁路制帽抱在胸前，另一只手不时地在前面比划着说。看样子他们到处都是这样讲过来的，声音有些嘶哑。可是当说到“有几万人”的时候，他用力重复了一遍，竟从龅牙的嘴里溅出了唾沫。

“政府廉价征购你们农民的粮食，又裁减我们工人，这同样都是吉田内阁的卖国政策！我们……”

我听起来，他说的几乎同我昨天跟这户人家讲的一样，觉得有些好笑。可是，坂井梅的父亲瞅着伸到炉旁、穿着草鞋的双脚，从嘴上拿下烟袋，用同昨天一样的表情听着。

“明白了，谢谢你！”

我抽出两 three 张十圆的钞票给他，一个年纪稍大的戴眼镜的人把油桶卸到门口的框上，开始数起糖块来。糖块全被热气闷软了。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母亲下到堂屋，把盛满咸菜的一个大碗放在进屋的门框上，问了这么一句。

那个龅牙的青年停下宣讲回答说：“昨天是在 S 村过的夜。”

“那末，是翻山过来的吧，嗯？”母亲拿着蓝色水壶钦佩地说。

站在堂屋门口的另一个人也走到旁边来拿起茶杯。和父亲说话的那个方才宣讲的青年，在堂屋蹲着仰起脸来说：“是的，我们一定坚持到把吉田内阁打倒！”

如果说是某某机务段，那是在邻县，看来他们不知花了多少日子，才在农村挨家挨户地转到这里来呢？其中那个年长的穿着绉纱衫的人向母亲打听去 N·F 该怎么走。父亲替她回答说：沿着这个村的公路向前走，走多远就是 F 岭，从那里可以望见天龙河，然后再往东走。说着说着，老人干脆站起身来，走到门外去了。

“太谢谢您啦。”

烈日当头。他们三人各自重新背起石油桶走了。过了



一会儿，从下面的路上传来了老人的声音：“要是走到N·F，就得到天黑了，真是太辛苦了呀！”

父亲回到堂屋，背着手，犹有所感似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母亲在地板间的昏暗处，正帮着媳妇给从昨天起一同开始抬头的蚕喂桑叶。她歪着头，从包头的布巾边露出花白的头发；在瘦瘪的嘴角上浮出了微笑，说不出是认命还是负屈。由于外汇汇价变动，直到去年的秋蚕，一贯<sup>①</sup>生茧还值一千一百圆，可是今年的春蚕已经落到七百六十圆了。

“究竟会怎么样，嘿嘿，我们可一点儿也不知道。”

即使我问她，梅的母亲也总是这样回答我。嫂嫂很能干，皮肤黝黑，瘦骨嶙嶙，嵌着一对漂亮的眼睛，她从高高的蚕台上把蚕箠拿出来又放回去，来回折腾着，更加不爱说话。

这时在堂屋的父亲突然走到门口去了。因为方才听到一阵阵走了调的喇叭声。使劲吹，喇叭却嘶哑了，不知怎么一弄，又突然发出尖锐的刺耳声。

“来啦，来啦，哎哟，可来啦！”

堂屋豁然亮堂起来。穿着白色罩衫的坂井梅，飞也似地走了进来，满面汗涔涔的。嫂嫂和母亲都下到了堂屋，我也走到外面看去。只见下边桑田间，尘土飞扬，烈日炎炎，村道上来了七八个人，有的手里拿着木偶，有的肩上背着手风琴，有的挎着小鼓，朝这边走来。后面还跟着一大帮

---

<sup>①</sup> 贯是日本的重量单位，一贯等于七·五市斤。

孩子。

“好，我是第一个到的！”

一个个子高大、姓渡边的青年，手里握着喇叭先跑来了。接着又来了两三个人，他们都翻身躺在堆在屋檐下的稞麦捆上。两手拿着木偶的松井队长和二十四五岁的芳姐，向坂井梅的父亲和母亲问候。这时候满脸通红，汗流如注，正在从腰上解下小鼓的大岛美祢子一看到我，她就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喊了一声：“噢，先生！”

她脸上流露出一种在一个没有想到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人的神情，一笑也不笑地看着我，突然向我鞠了一躬。她还是跟过去一样，矮个子，小鼻头，短下巴，可是比以前见到她的时候晒得黑多了，也瘦多了，长成大人样子了。

“会打鼓了吧。”

“正学着呢。”

她睁着圆圆的眼睛认真地说完以后，就一瘸一拐地向屋檐下的稞麦堆走去，想挤进人堆里坐下来。大伙儿穿戴朴素，美祢子更为突出。也不知道是用什么布做的红色束腿裤，裤脚白糊糊地沾满了尘土，背上系带的绛紫色工作服上衣也完全褪色了。

“什么哟，我脚痛呀！”

她脚趾上缠着绷带。拿着喇叭的渡边这个年轻人，虽说身体高大，却是十九、二十岁的人，他不肯把叉开的两条腿收回去。

“不行，不——行！”

在那里，除芳姐以外，都是小伙子，故意使坏的渡边的话声和其他人的笑声混成一片。渡边说：“这里是我的，我先占的！……”

大岛美祢子被挤得简直要从麦堆上掉下来，气得左瞧右看。她跳了下来，站在他们面前，把两条辫子猛地往后一甩，涨红着脸，使劲说道：“毛泽东说的——要照顾女同志！”

说完，就咕咚一声坐回到刚才的那块地方。有人说：“你胡扯，毛泽东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在一片欢笑声中，大岛美祢子不高兴地绷着脸……

这栋屋檐矮得简直象要挨着地似地稻草小屋豁然明亮起来。坂井梅和母亲把象是事前准备好的酸黄瓜啦，蓝色水壶啦，都端到屋檐下。父亲似乎怕晃眼，歪着系着布巾的脑袋站在屋檐下。这时候腾出了一块地方，大岛美祢子就躺在那里。父亲悄悄拿起她脱下来的那双磨薄了的木屐翻过来一看，原来趾祥儿松了，看后就把它拿进土间，过了一会又走出来。他给她换了一副趾祥儿，又悄悄地放回大岛美祢子的脚下。可是她天真地微张着嘴睡着了，托着脸的手也慢慢地滑了下来。在农村巡回演出的文工队，睡眠时间非常少，年纪最小的美祢子可能是太累了。

“一、二、三，开始！”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他们七个人在房前站成一个圆圈，准备绕着在F村里这个最大的庄子走一遭。合唱队的队长，大家叫她“芳姐”，我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她矮胖、腰粗，

上身穿缫丝厂时期的藏青色工作服，下身穿白色的裙子。她举起两个手指，突然往下挥动，大岛美祢子的小鼓就首先敲了起来，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叭啦……她两条辫子随风飘拂，小鼓敲得很熟练；她抬起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指挥的手势，敲着鼓。渡边的喇叭响起来了，这个叫什么“贝斯”<sup>①</sup>的粗大的喇叭一响，手风琴也响起来了，队长松井还吹起了口琴。尽管乐器不配套，但他们都经过一番训练，所以也能奏出与其相称的音乐。譬如《晴朗的五月》、《赤旗歌》、《国际歌》等等。——从山涧爬上来的戴着蓑笠或是在麦秸帽上系了布巾的人，出现在桑田和田边土堤上；背着竹篓、站在路旁的姑娘们，停下小推车的老大爷，停下自行车、把一只脚踩在地上的青年……新颖明朗的旋律，掠过梯田、杂木林和山涧，打破了这个村庄以往的那种沉闷空气……

文工队出发的时候，我夹在孩子们当中也跟着走了一段路。松井用只手把木偶“钝太”——一个穿着印有字号的外衣，头上系着布巾，长着大红鼻子的木桶匠——举得高高的，每当走到十字路口或住家稠密的地方，他就拿起挂在胸前的扩音喇叭，介绍起演出的节目。太阳还老高呢，走过五六处人烟稠密的地方，又在尘土飞扬的田间小道走了一阵。渡边鼓着汗涔涔的腮帮子，朝天使劲地吹喇叭。松井则大声喊道：“乡亲们，今晚八点钟，在合作社二楼，演出……”可是悠然回答他的却只是来自遥远森林的回声和报时的

---

① 贝斯是英语 bass 的译音，意思是低音，也指低音乐器。

鸡鸣。

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背上背着一个脑袋晃来晃去的小孩，从庄稼地的土堤上跑过来；一个象是她弟弟的男孩子露着肚脐，满身是泥，拚命跑着想要赶上那个女孩。但是，文工队并不是到什么地方都受欢迎的。当这些脖子上系着脏得象用酱油煮过的布巾、穿着皱皱巴巴的裤子、上面粘满尘土的文工队员走过小溪边的时候，有两三个正在洗衣服的中年妇女停下了手，我听见她们在后面这样说：“闹罢工，哼！”

“那个矮丫头，瞧她那个德行！”

他们来到一家农户的门前，这家农户隔着篱笆，从白墙仓库前，可以看到在宽敞的场院的角落里有一眼辘轳井，两三个队员一拥而入，争着去要水喝。在仓库前的阴凉地儿里有一个拄着拐杖的皓首红颜的富泰的老太婆和一个抱着孩子的象是儿媳妇的妇女。她们好象听到喇叭声才走出来的，正往这边看。脸色凶狠的老太婆说了些什么；那两三个用吊桶喝水的队员，边擦嘴边说“对不起，对不起”地逃了出来。这时去得最晚的大岛美祢子，把小鼓放在爬满鲜艳的虎掌花的篱笆根下，站在水井边，难为情地看着老太婆；老太婆说了句什么，她就穿过场院，走进一座能够看见宽敞的堂屋的房子里，很快就拿着一个水舀子走出来。老太婆一瞧见，就用拐杖咚咚地戳地。大岛美祢子撇了撇嘴，变得更不好意思了，她又回到屋里，那个抱着孩子的媳妇也随后跟了进去。大岛美祢子这回拿出一个钢精杯。

“脏死啦！……饿鬼！……”

就在她喝水的时候，这个脾气暴躁的老太婆正在摇着头生气。于是大岛美弥子进屋还了杯子，依然羞答答地红着脸，用掖在束腿裤前面的布巾擦了擦手，猛地向老太婆和媳妇行了一个礼。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悲伤的、快要哭出来似的神情，望着那个还在嘟囔着什么的老太婆，忽然把头一扭，用更高的嗓门喊道：“今天晚上八点钟……请乡亲们来看……大人小孩都乐意看的木偶戏……”

她离开那个还在那里拄着拐杖、张着嘴的老太婆，红着脸回到篱笆的前面，低着头，没有留意到我，急急忙忙地把小鼓的皮带系在腰上。我看到不知是大滴汗水呢，还是眼泪扑簌簌地从她垂下的脸上滴落下来。

#### 四

正如坂井梅的父亲所预言的，从傍晚开始，忽然降起山区特有的阵雨。但等到农家吃过晚饭，九点钟左右，会场就已经超满员了。合作社的二楼本来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可是到了三百多人，从走廊到楼梯口挤得水泄不通。自救组的七个姑娘，有五个来会场当招待员。

主办这个晚会的村党支部的人和从伊那镇来的党地区委员，都热情地帮忙。小孩和老人坐在前面，青年人和中年人坐在后面，因为接待人员态度和蔼，所以村里的人也都比较顺从听话。先由村党支部M君致词，接着我以工会联合

会总部的名义讲了川岸工厂罢工的事情。之后演出了第一个节目：大合唱。耿直的M君剃着和尚头，因此，他那乌帽子<sup>①</sup>头格外显眼。他的致词，如其说他是作为一个共产党的代表，不如说他是作为一个大家所熟悉的农民伙伴更亲切些。

“来吧，乡亲们，大家一块儿唱吧，预备，唱！……”

队员们排列在拉着黑幕的舞台前面，唱完了《晴朗的五月》、《劳动之歌》，接着又唱了《木曾小调》、《伊那音头》和《御袈裟小调》等歌曲，这时候，手拿指挥棒的芳姐突然转向观众，要求大家一齐唱。大岛美祢子个矮、排在最前头，她们用布巾扎着头，探着身子，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唱起《木曾小调》的时候，果然观众也唱了起来。这是他们在川岸村演唱外国民谣选曲遭到失败，进行了自我批评以后所采取的方针。尽管队员们头上系着好象在酱油里煮过似的布巾，身上穿着皱皱巴巴的裤子或束腿裤，但他们那种纯朴的感情已和农民融合在一起。虽然没有酒，也没有伴奏，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摇头晃脑地用手打着拍子，偶尔夹杂着老大爷的粗嗓门儿，歌声响彻整个会场，舞台和观众的距离顿时消失了。我一边唱，一边观察周围观众的脸，觉得眼泪就要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似的。老大娘们晃着满头白发的脑袋，拍着长满皱纹的手，露着兴高采烈的笑

---

<sup>①</sup> 乌帽子是日本古代官员和武士戴的一种乌纱帽，后来有人改用纸做，涂上黑漆。这里指头形象乌帽子。

脸；孩子们象小燕子似地张着嘴，仰着脸，唱着歌；老大爷们开始还有点矜持，逐渐把手撑在盘着腿的膝盖上，象是要领唱似的，扯开嗓子唱起来。舞台前面的队员们已经完全被遮住了。大家仿佛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爬上来，如今在这里邂逅相遇；又恰似被忘却了几十年的，不，几千年的事，突然涌现在眼前。这既不是为了张三，也不是为了李四而高兴，而是因为大家在这里如此相聚，大家在这里如此活着而高兴。这一瞬间使人感到就象是从遥远遥远的过去苏醒过来似的。

我是木桶匠钝太，  
要做木桶快快来，  
酒桶、酱桶、酱油桶。

.....

咚——咚，咚，咚，咚！

合唱完了，接着演出木偶戏：《钝太木桶店》。在歌声和伴奏声中，一个叫钝太的木偶和一个叫小东西的狗木偶，出现在黑色幕布上象窗口似的开了个洞的地方亮相，这出戏就开场了。围绕着一个会走动的“妖怪桶”，老好人工人普吉、红鼻圆眼的警官、白头发“慈菇”脸的祭主，一一登场。他们的动作和台词越滑稽，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揭露就越深刻。会场上的笑声越大，气氛也就越紧张。因为钝太、普吉、警官，这些角色都是木偶，所以观众根据各自的信念和思想，不论想象得多么深刻、多么复杂都可以。只要文工队的队



员们专心致志，同心协力地演出，即使演技低些，也能把观众的情绪提高到象山一样高。

节目是按照《钝太木桶店》、《画家普吉》、《大箱子》这样的顺序演出的，从后台传出狗的叫声，资本家的粗野而低哑的说话声，女议员“是啊是啊”的尖尖的叫喊声。——我对演戏一窍不通，可是任务摆在眼前，所以我时常到后台去看看。在那里，有时学狗叫的松井，手脚趴地，简直象要舔那肮脏的地板似的，额上暴起青筋，汪汪叫着。有时渡边用一只手操演木偶，一只手按着鼓起的喉咙，学着肥胖的资本家的喇叭嗓，弄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有时扮“女议员”的芳姐，掩着工作服的前襟，扭动着粗壮的腰肢，抿着小嘴，“噢，啧啧”地笑着。唯独大岛美祢子自始至终一只手拿着脚本，给忘了台词的演员提词，另一只手忙着敲木桶底，发出拟音，或者把要出场的木偶递给操演的伙伴，或者是拉幕。大家在头上都系一条吸汗的布巾。两只手都占着的时候，就用脚来比划着打招呼，他们就是在这样又热又窄的地方拼命地工作着。

幕间，已经接到解雇通知的村邮局职工代表和从苏联遣返回国的人讲了话。二十五六岁，穿着黑色制服裤的邮局代表，一个劲地擦着头上的汗水，几乎没有抬头，宣读完了以全国邮电工会长野县分会某某地区的名义写的控诉书，马上就下来了。这固然因为不习惯，但更因为这些所谓的观众都是他朝夕相见的熟人，所以使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观众露出一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情。有的拿下了烟袋，张

着嘴；有的歪着头仰着脸；有的低着头把下巴颏放在抱着的孩子的头上。不是听不懂他讲的内容。从他们的脸上的表情，可以明显地看出控诉书有力地戳穿了所谓“学校和邮局裁人就会减税”的反宣传。可是今天在这里，不管你多么会讲话，也不管你怎样追问他们：“同意还是不同意？”恐怕他们谁也不会开口的。紧紧地套在他们身上的新的现实和旧的现实，那要更加深刻。——这就是他们脸上的神情。

最后放映幻灯片：《白袜子一家打砸抢记》，从黑暗的角落里，不时传出象用骨瘦如柴的手拍袜底似的鼓掌声。这是东芝工会联合会文化部编写的，也是文工队的压轴节目。他们不仅演得熟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喇叭声、鼓声轰然而起，立刻唱起男女混声合唱。三月的一个大雪天，一群警察从川岸工厂的后山蜂拥而来，闯入川岸工厂这个镜头，放了足有五分钟，这时从各个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了《国际歌》声，我借助银幕的反射光线，看见那些认为“不能娶川岸工厂的女工作媳妇”的村里的人，在昏暗的会场内都屏息凝神地看着。

“乡亲们，谁要是还有时间，那就请留下来参加座谈会，给我们刚才进行演出的文工队提出批评；对川岸工厂罢工的问题……嗯，现在还不到十二点，近处的请……”

当观众站起来的时候，到了台前的队长松井，仰起戴着眼镜的脸，用沙哑的声音喊着。拥挤着从唯一的一个楼梯口往下走的人们，有的就停下来听松井讲话。——毫无疑问，大部分人是为了寻求娱乐而来的，现在大概又带着“有

趣”、“没趣”的感想而归。但是，同时可以肯定，大部分人都看到了“意外的”东西。他们的兴奋还表现在那些残留的零乱碎纸和会场专用烟碟上。村支部的人收拾舞台，坂井梅卖力地打扫着铺着席子的宽敞的会场……

文工队这种工作，它究竟从哪里产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呢？雨早就停了。从我坐着的背后的窗户，可以看到山峦之间的星空。座谈会在进行着，开始留下来的约有五十来人。翻山越岭来的S村的两个青年，给文工队提了很好的意见以后也回去了，现在剩下三十来人。他们向文工队提出希望，向从苏联遣返归来的人提出质问，还谈了下山事件和三鹰事件。并排坐着的文工队员们也都疲倦极了，尽管松井和芳姐还坚持着，可是靠着楼梯口扶手的大岛美祢子，两手撑在膝盖上，不时地睁开发涩的眼皮，又合上。不知从哪里远远传来了鸡啼声。他们明天还要乘头班车到另外一个村子去。我看到在矮鼻子下面的下嘴唇耷拉下来的大岛美祢子的侧脸的时候，感到这是在无情的搏斗中前进的这个社会所产生的既不可理解又不可避免的东西。

“我说，先生……”

这时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里的一位大伯，少有地叫了我一声。这人四十五六岁，黑脸盘儿，眊眊眼，穿着一身军服，盘腿坐着，两膝间放着一个象小学生背的书包似的大背包，从开始就一直低着头。从他那磕烟袋锅的手势和肮脏的络腮胡子，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庄稼人。从昨天晚上起，不论在青年会馆，还是把会场换到寺庙正殿的时候，他都跟

去了，而且都用同样的姿势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我大体上也猜到是这么一档子事。”

他抬起深陷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当他轻易不开口的嘴，连同那嘴边不加修饰的长胡子一起动起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使人感到会场上的空气为之一变，在这以前的高昂的兴奋的声音骤然停止，大家把视线都集中到他的身上。虽然正在谈论下山事件，可是在座的人们很快觉察到这位大伯的话未必是单就这个问题说的。

“是啊，因此，报纸这类东西……”

年轻的地区委员嘴快地说出这么一句。接着村支部的M君又说了。这看起来，好象必须马上搬起好容易才动摇的沉重的大石头似的。眼前的“沉重的大石头”却难为情地向那边看了一眼，当他把视线移到我的脸上的时候，便谈了自己个人的事情。

“这件事我想是想过了。不过，的确，哼，光由我一个人说出来，总是要倒霉的！”

“哈哈！”大家哄堂大笑起来。一直没有开口的老大爷们和青年们心里象是顿开茅塞，豁然开朗似地笑了起来。村党支部的M君好象知道那位大伯是某庄的什么“兵卫”，他笑得最厉害。大家越笑，那个眦睨眼、黑脸盘的大伯也就越认真、越激动。——他的发言看起来是不足道的，但却是很重要的。尽管这里是一个小村庄，但却堆着一堆堆的石头。谁要是敢说句什么，就一定会受重伤。而且结了沉默的疮痍。现在这个疮痍掉了。笑声非常亲切，并包含着复杂的

感情。有人短短插上几句话，大家又都笑了起来。

已经产生了影响。我想这就是文工队工作的一部分啊！我向大岛美祢子那边一看，她突然象受惊似地睁开了眼睛。使人感到她恰似睡着了的狗似的，听到了响声，就赶紧竖起耳朵，抬起头来。她脸贴着楼梯扶手往楼下看，忽然站起来，顺着楼梯下去了。因为离我坐的地方很近，我也下去了。在楼下的传达处，坂井梅被五六个青年包围了。因为临时拉线的一百度的电灯熄灭了，显得有些昏暗。穿着白衣服的坂井梅，一面找词儿争辩，一面往后退。象是从什么地方回来的一些青年，喝得酩酊大醉。里面有昨晚见过的那个瘦高个青年，他穿着浅色夏威夷衫，下摆耷拉在裤子外面；手里拿着一把粗糙的雨伞，一只穿着木屐的脚踏在台阶上。

“你们是以演木偶戏为名，把大家召集来的吧，哼！”

在昏暗之中，看到对面一个穿着白色单衣、戴着眼镜，年纪似乎稍大的人，劝阻着说：“算啦，算啦。”可是另外一个戴白色登山帽的人，嚷了句什么，坂井梅象躲闪似地往后退。

“你们是共产党吧！”

穿衬衣的这么一说，另外的两三个人中有人喊：“是赤色分子，是赤色分子！”这时大岛美祢子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矮个子、头发发红的美祢子，她把头一歪，用特别爽朗的声音说：“请！请进！”

那个穿夏威夷衫的，把脚从台阶上放下来，简短地怒骂

一句什么，美祢子就把辫梢一甩，歪着头，笑着又前进了一步。

“请进！里面正开座谈会哩。请不要客气！”

青年们后退了五六步，在昏暗之中瞪着大岛美祢子，七嘴八舌地骂着。坂井梅也走到那边去了；大岛美祢子把放在那里的木屐穿上，向外走出两三步，高声说：“请，请进！请大家给我们文工队提意见……”她这么一说，有人就嚷：“我揍你！这个丫头！”有的说：“算啦，算啦！”还有的说：“真他妈混蛋共产党！”叫骂声混成一团。这帮青年被那个年纪稍大的、穿单衣的人制止着，在黑暗中渐渐走远了。

“多不讲理呀，这是西下村的家伙。”坂井梅依然很激动地说道。

走回来的大岛美祢子瞪大了圆眼睛天真地说：“这种人不管哪个村都有！多——着呢。”

她象是好容易才把睡意赶走似的，轻声地唱着：“木曾川啊，撑排的人哪……”同时用合唱时的姿势，蹦蹦跳跳地上楼去了。

(1950年1月)

盛继勋译